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推动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旅游富民效应 大力推动共同富裕

旅游富民效应显著,站在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的新起点上,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旅游业大有可为

□ 张金山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大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很好地实现了让这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与此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一度攀升到2008年的0.491,随后虽然一度出现下降趋势,到2020年依旧高达0.47,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突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简称“提低、扩中、调高”),从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消除贫困、千方百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向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中之重。旅游富民效应显著,站在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的新起点上,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旅游业大有可为。

一、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特有性质

直观地看,旅游活动总体上是一种富裕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旅游消费天然地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生活性服务业,而生活性服务业的开展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一般不创造新的财富,这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相比的根本区别。因此,发展旅游业、刺激旅游消费本身就是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式。纵观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旅游富民效应突出的特点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长期以来也是作为脱贫攻坚和增收富民的重要手段。新发展阶段,有必要深化旅游发展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和推动共同富裕作用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发挥旅游业的富民效应。

第一,旅游活动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具有调节收入的独特作用。简单来说,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分配,而三次分配是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等方式进行转移支付。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最近强调的三次分配依靠道德。由此可见,强调效率优先的初次分配向来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环节,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提出就是为了弥补初次分配

的弊端,是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从需求侧来看,富裕群体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主体,旅游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通俗地说,“有钱”和“有闲”是保障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从供给侧来看,低收入群体往往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为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水平低。旅游活动的开展或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实质上就是一种在初次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调节和财富转移。

第二,旅游活动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还具有市场调节、高效直接、上门服务等优点。旅游活动由于在初次分配环节就调节收入分配,是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机制而实现,可以说是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开展收入分配调节的典型产业。旅游消费活动的财富转移效应高效直接,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旅游消费属于居民最终消费,2019年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高达6.63万亿元,可以说大部分的旅游收入以工资、服务收费、销售收入、经营收入等形式直接转化成为旅游从业人员的个人收入。旅游活动是一种异地消费的过程,富裕群体前往旅游从业人员的惯常环境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因此大多数旅游从业人员是坐等游客的上门花费。综上所述,与通过构建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税收调节的二次分配方式相比,旅游活动在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直接且高效。

二、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推动共同富裕,除了需要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提低、扩中、调高”,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等直接性举措之外,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脱贫攻坚、拉动就业等方面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更加基础性的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旅游业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曾经将区域先后发展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不足,然而这些地区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条件。近年来,来自东部地区的游客和旅游投资迅速增多,外来旅游消费和外来旅游投资成为弥补内需不足的关键力量。从实施“对口援疆”“对口援疆”计划来看,旅游领域的对口支援力度呈不断上升态势,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般包含有支援旅游发展的内容,比如“旅游兴疆”战略。

第二,旅游业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突出。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

国家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地区休闲旅游消费,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自发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近些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由2012年的7.2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32亿人次,年均增长23.7%,占到国内游客总人次的50%以上;旅游收入由2400亿元增长到8500亿元,年均增长19.8%,占到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5%。两项数据均明显高于同期全国旅游业的平均增长水平。

第三,旅游业促进脱贫攻坚的成效显著。完成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征程中,旅游扶贫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根据《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口达264万,占年度脱贫总人数的18.3%。旅游扶贫还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方式,通过引导贫困地区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旅游脱贫农户一般具有返贫率低的显著特点。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农家乐、精品民宿、采摘农业、田园休闲等旅游形式依旧为城市居民所热捧。

第四,旅游业拉动就业的作用向未突出。拉动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旅游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服务员、售货员、保洁员、导游、讲解员、车船司机、保安、停车场管理员、个体户、农家乐经营户等农民工、农户、妇女、老年人、下岗再就业群体等,学历低、专业技能低。旅游业总体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就业门槛低、容量大。旅游业吸纳的就业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路上需要“提低”的重点人群。根据《201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17年全国旅游直接就业828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旅游就业大多为本地就业,对于那些不具备外出打工能力的人员来说,旅游发展创造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机会。

第五,旅游业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随着大众旅游时代来临和全域旅游发展,曾经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古镇古村等相对偏远的地区也开始为游客所青睐。旅游业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手段,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文化认同;旅游业是促进偏远地区对外开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开阔居民视野和增长见识;旅游业是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增进当地居民对地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旅游业是丰富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引导社区居民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三、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适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富民效应,

应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着眼点,以充分释放旅游业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为落脚点。

第一,扶持中西部等地区旅游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旅游市场的重要作用。在迈向共同富裕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伟大征程中,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东部游客前往西部、东北、中部等地区开展旅游活动。要实施西部旅游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旅游振兴、中部旅游崛起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鼓励长线旅游的发展,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旅游市场优势,努力构建国内旅游市场大循环格局。

第二,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发展。大力推动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产业园、家庭农场、特色小镇、古镇古村等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引导成立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化水平。优化乡村旅游营商环境,努力破除制约农家乐、精品民宿等富民效应突出的乡村旅游经营业态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实行集合工商、消防、公安等部门的一站式联合审批机制。研究出台鼓励农村闲置宅基地对外流转开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的办法,引导已经在城镇落户的子女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开展旅游经营。

第三,实施旅游消费提振促进计划。充分发挥旅游业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天然作用,大力开展文旅消费试点示范工作,努力打造有利于文旅消费集聚化发展的旅游休闲街区 and 夜间文旅消费载体,积极培育文化主题突出的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实施旅游消费促进计划,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景区淡季免费开放、往返机票打折、高速通行费减免、演出门票打折等政策。定期或不定期发行文旅惠民消费券。

第四,引导出境旅游需求国内释放。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世纪以来曾经高歌猛进的出境旅游受到抑制,出境旅游需求回流。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花费高达1200亿美元,人均花费1000美元以上,两项数据均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的高消费一度成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缩影。要合理引导房车自驾、低空飞行、海滨海岛、邮轮游艇、养生养老、滑雪运动等高端旅游形式的发展,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旅游兴藏”战略,积极承接潜在的出境旅游需求,努力打造替代性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科学引导被压抑的出境旅游需求“出口转内销”。

第五,维护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权益。协调处理好政府、外来投资商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在景区景点、文旅综合体、主题公园、特色小镇、古镇古村等大型文旅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努力保障社区居民旅游发展的优先获益权。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表明,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过大源自劳动报酬的增长越来越落后于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因此,要努力维护旅游从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勤劳致富合法权益,适应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实施向劳动者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融合模式,寻求“文旅+”向更多元、更多方向发展。

4. 文旅共建,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形成两者共生共荣、共建共享的难以分离的共生体。一是打造文化和旅游融合IP,根据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情况,提炼文化和旅游融合品牌形象,推出一批文化和旅游融合示范企业,打造一批文化和旅游融合龙头企业,形成地方文化和旅游融合IP。二是整合多方资源、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从政策制定、资金支持、人才支撑、企业创新、行业组织引领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三是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产品,借助数字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一批“沉浸式”文化和旅游融合产品,提升游客的感知体验,体现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魅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保障中心)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研究优秀成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年轻干部工作历史经验的思考

□ 程韦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优秀年轻干部工作。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该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党掀起了新一轮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热潮。本文梳理了党在各个时期对年轻干部工作的探索实践历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启示,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一、实践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这一时期,党始终注意团结青年、培养青年、引领青年,经过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培养新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延安时期较为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值得学习研究。

1. 党成立初期对青年骨干的培养。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很强的青年属性,党的早期组织中,青年占比达70%。工人夜校等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革命骨干。1924年,中央设立组织部,出台《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对成立党校提出要求。1924年冬,第一所党校在江西安源成立。自此,党校教育成为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方式。

2. 干部工作在曲折中探索前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1931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干部使用重成分、轻能力,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影响。1935年初,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命运,12月,瓦窑堡会议强调“要有成千上万的新的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提出在实践中培养干部、爱护信任干部等思想。

3.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热潮。中央高度重视对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教育,1939年,设立了干部教育部,成立了陕北公学等30多所学校。干部教育分为在职干部教育和党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分类实行,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1935年,中央党校在瓦窑堡成立。1940年,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党校教育逐步规范化体系化。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整肃了干部队伍。这一时期,年轻干部工作有发展也有曲折,首次提出“接班人”问题,选拔了一批新生力量,但也因时代原因陷入停顿。

1. 开展干部审查和肃反运动。1953年,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专班形式,通过查阅分析档案对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等进行审查。1955年,将审查工作与肃反工作相结合,直至1957年才结束。审查工作纯洁了干部队伍,全面了解了干部情况,为有计划地培养使用干部创造了条件。

2. 首次提出培养“接班人”。面对领导干部“老龄化”趋势,1964年,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964年至1965年,各级组织部门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1000多名优秀分子进行重点培养。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省、地以上的年轻领导干部。

3. “文化大革命”期间优秀年轻干部工作陷入停顿。这一时期,反革命集团控制了中央组织部,一大批投机分子走上领导岗位,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刚刚建立起的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机制随之被束之高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这一时期,中央建立了干部离退休、选调生等制度,形成了优秀年轻干部工作体系,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后备干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干部支撑。

1.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为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2年,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新老干部开始有序交接。

2. 大力选拔年轻干部。1979年4月至1980年初,中央组织部开展优秀中青年干部考察,形成了一份160多人的名单。1980年,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成立青年干部局,印发《关于选定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的通知》。1981年至1985年,中央大力推进领导班子“四化”,干部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提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3. 建立第三梯队和选调生制度。1983年,中央提出建设“第三梯队”,随后4年间,共选出省部级第三梯队人选850多名,地局、县处级第三梯队人选数万名。1980年,中央提出建立选调生制度,要求各地各部门每年挑选一定数量有培养前途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放到基层锻炼,至1985年底,共选派12700名选调生。

4. 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深化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强调要加强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印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等,部署开展省部级后备集中考察,明确各级党政正职配备的年龄要求。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央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净化选人用人生态,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力度,推动形成了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1. 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部署。2014年和2019年,中央两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颁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2015年,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2019年,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这些制度的实施,为深入开展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2014年6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7月,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座谈会,会后开展专题调研,掌握了一批近期可进班子的后备人选。2018年6月,中央审议通过《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随后,开展了新一轮优秀年轻干部专题调研,成立了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办公室,统揽优秀年轻干部工作。

二、经验启示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做好年轻干部工作的根本前提。回顾百年党史,每当党的政治路线出现偏差,年轻干部培养必受影响,政治路线调整后,年轻干部工作很快就能重回正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中央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有着清晰的判断,作出了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战略部署。我们应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党历来重视对干部的政治考察和教育。当前,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宣传思想工作系统历来处于意识形态斗争前沿阵地,对干部的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年轻干部必须更加坚定党性立场、对党忠诚。在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上,必须深入总结党在政治考察和政治教育上的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切实把忠诚干净担当实干清醒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三)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必须坚持统筹规划。优秀年轻干部工作是系统工程,必须做到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健全党组领导、人事司牵头抓总,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参与的工作机制。二是加强分析研判。基于对领导班子建设的动态分析研判,调整优秀年轻干部培养计划。三是拓宽选人视野。统筹用好机关干部、驻外干部、直属单位干部三支队伍,及时从系统外引进急需特需人才。四是畅通培养渠道。打破司局和单位局限,让年轻干部在吃劲岗位、重要岗位上充分历练、增长才干。

(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必须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就像打造良弓,需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磨炼,不能急于求成。实践中,应当把握好充分历练和大胆使用的关系,少数特别优秀的可以“小步快跑”,多数还需扎实历练。要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干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如对“艺术家干部”,如何兼顾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解决行政工作和艺术创作“工学矛盾”,需进一步拓展思路,完善培养和管理机制。

(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

□ 廖海利

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应该从融合的角度、广度、深度等几个方面着手,多角度、全方位助推。

1. 以文塑旅,从“旅游+文化”角度推动融合发展。“旅游+文化”,即在旅游的基础上融合文化,重点在以下几方面融合:一是旅游与文化元素相融合,结合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深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名人文化、艺术文化等文化内涵,根据旅游开发对象特色,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载体。二是旅游与公共文化设施融合,推动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驿站等公共文化设施进旅游街区、景区、公园、游园等旅游场所,开展文化惠民惠民、文化志愿者服务等,增加旅游活动空间的文化属性。三是旅游与公共文化服务相融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美术展览、艺术表演、读书活动、公益讲座等公共文化服务引入旅游活动空间,提升旅游场所的文化氛围。四是旅游与文化产品相

文旅融合的角度、广度与深度

结合,大力开发旅游演艺、主题公园等文化旅游产品。将文化创意融入旅游商品的设计和开发,提升旅游商品的文化品位和价值。

2. 以旅彰文,从“文化+旅游”角度推动融合发展。“文化+旅游”,即在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旅游,重点在以下几方面融合:一是加强文化设施场所的旅游开发利用,提升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旅游功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开发研学旅游、文化主题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增加公共文化空间的旅游属性。二是加强文物的保护开发利用,以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在充分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对文物进行旅游利用开发,活化文物资源,形成一批公共性文化景观。三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结合地域特色,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化体验等旅游活动开发,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四是加强文化艺术活动的旅游开发,以地方文化艺术地标、地方文艺演出精品等为主题旅游吸引物,大力开发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旅游线路产品,发展地方文化艺术旅游。

3. 文旅共生,“文旅+”助推文旅产业广泛融合。“文旅+”,即基于“文旅”整体概念,与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一是加快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快速融合发展,如“文旅+农业”“文旅+工业”“文旅+科技”“文旅+教育”“文旅+体育”“文旅+健康”“文旅+商业”“文旅+金融”等,拓展文旅发展领域,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进一步深化文化和旅游的互融关系。二是结合不同空间场景,推动“文旅+乡村”“文旅+城市”“文旅+大自然”,拓展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空间。三是结合流行元素,推动“文旅+电竞”“文旅+综艺”“文旅+直播”“文旅+剧本杀”等新型